

张立增 著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ZHONGGUOWENHUA YU MARXIZHUYI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张允熠 著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张允熠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13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

ISBN 7-5440-1444-4

B·19 定价:17.60 元



张元屠 1951年11月生于江苏沛县,199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长期从事于哲学、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曾在《中国哲学》、《社会学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海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译丛)、《二十一世纪》(香港)等二十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有《阴阳两仪论》、《回归乐园》等著作。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探讨和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体系之间关系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中西文化交融的恢弘背景上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性大转型,从而对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科学预测是本书的立意所在。作者运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包括莱布尼茨、黑格尔在内的欧洲著名哲学家和欧洲思想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深远影响,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吸收和包容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东西的思想体系。本书还对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转型及现代中国思想领域中几派的交锋和互动作了深入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特点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提出会通中西和超越中西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和发展方向。

序 言

张岱年

欣闻张允熠同志的新作《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即将出版，可喜可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但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此，长期以来，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又不能回避。

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主张采取分析的方法。儒学中有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和互相补充。矛盾的部分好讲，互相补充结合的部分不好讲。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强调人格的独立性，这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儒家讲“和为贵”，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不讲“和为贵”，但从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讲还是“和为贵”，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互补充。冯友兰先生晚年赞成张载的四句名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先生说，前三句马克思主义也是赞成的，有异议的是第四句。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赞成“仇必和而解”的，冯先生推断说马克思主义主张“仇必仇到底”。我的意见有些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一定主张“仇必仇到底”。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某种情况下应该斗争，

某种情况下应该和解，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指出“有些情况下要斗争，有些情况下要合作”，冯先生的说法简单化了。“仇必仇到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为贵”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不能相容，这里有个辩证关系。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就符合辩证法。邓小平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具有灵活性，“一国两制”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创造。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之所以能成为判断问题的标准，就是因为在今日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为贵”就比较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提法。儒家有两个基本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主张人格独立，其二是强调社会责任心。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但每一个人又都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两个观点至今仍很有价值，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我想他们肯定是了解的，因为自17世纪欧洲人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哲学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条件看到。当然，他们的文章中很少谈到这一点。从欧洲哲学史上看，17世纪莱布尼茨、沃尔弗很重视中国，但到了18世纪，康德开始看不起中国了。不过，正像欧洲有人指出的那样，康德哲学与程朱哲学非常接近，都讲理性。尼采就曾说过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意思就是说康德哲学很像中国哲学。但这个“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却是德国第一个看不起中国人的大哲学家。现在讲德国古典哲学只从康德讲起，而根本不提莱布尼茨，我对这种做法一直不明白。中国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莱布尼茨很看重中国哲学，从莱布尼茨、沃尔弗开始在德国提倡中国哲学以来，直到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他们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莱

布尼茨、沃尔弗推崇中国哲学，而到康德却一反其道，转为鄙视中国哲学了，尤以黑格尔为代表。国家弱被人看不起，人家吸收了你的东西还要转过来骂你。法国的伏尔泰也很推崇中国哲学，但从康德开始，英法哲学家都看不起中国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对中国哲学评价很高，以后就不行了。

西方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哲学到底是怎样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中没有“理性”，这是很不对的。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与中国程朱学派的“理”有相似之处，朱熹的“理”翻译成西文就是 reason，就是“理性”。其中有一个问题很复杂，即西方哲学强调真，而中国把善放在至上的位置。无论真和善，都属于理性的范围。程朱的“性”与西方人的理性也很接近。当然，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讲“理性”，这与近代欧洲哲学所说的“理性”也不完全一样。哲学界不妨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理性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的同异、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中世纪有几百年中断了，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

如何评价西方中世纪哲学，好像也有争议。近年来有一部书，叫《世界十大思想家》，其中第一个是孔子，还有柏拉图、阿奎那等人。把阿奎那也看做一个大思想家。

黑格尔看过《周易》、《老子》，大概也没有看懂。有一个历史事实：从康德到黑格尔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唯物主义评价比较高。康德是二元论的高峰，黑格尔是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代表，黑格尔的“最高理念”或“绝对理念”实际上就是朱熹的“太极”，二者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在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在当时欧洲的“中国热”中，德国哲学家都间接地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

另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应该深入研究，他晚年

全部否定儒学，可他晚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对儒学肯定的也不少。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他不懂外文，他一生看的都是中国书，而且大多数都是古书。周恩来曾留学欧洲，他的外文很好。但他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点。那么多留学生在中國都没有成功，毛泽东能成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张允熠同志做的这个题目很重要，能首先选做这一课题，是需要有些理论勇气和眼光的。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重要的是要多掌握资料，实事求是。这确是一个大问题。到了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发扬优秀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些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提倡“百家争鸣”，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谁也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中哲与西哲的比较问题，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后一句话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只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恐怕就不够了，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是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1998年2月

自序

中国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本书难以尽述其详，此处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内容结构和思想体系十分庞杂，既是一种政治文化，又是一种理型（Idea form）文化。就其理型文化的层面来讲，又称其为儒学。本书主要从儒家文化的理型层面（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来考察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转型和发展走向。

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一直居于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自从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碰撞、交会的开始，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型意识形态的儒学便捉襟见肘，其危机终于在西学的参照系下暴露无遗了。清代实际上是宋明新儒学急剧衰微和“古学复兴”的时代，即使没有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开进中国，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也必将出现内部变革。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早在四五百年前已经开始踏上潜在的革故鼎新的历程了。近代以降，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之西方科技文化和工具理性的输入，中国的传统文化日趋陷于低谷，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备受窒息。出于对“大一统”封建帝国的迷恋，一部分士大夫要求保存“国粹”，这些人旧学深沉而新知不足，在精神上承延宋明理学遗绪，以后几经蝉蜕进化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派；另一部

分先进的中国人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早自 16 世纪起就提出了对于西学“欲求超胜，务必会通”的口号，这一思想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近百年来汹涌澎湃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巨川。江河奔腾，泥沙俱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人从西方几乎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启蒙时期的政治社会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英国的进化论、美国的实用主义和 19 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这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精神大探险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伊始邂逅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西思想交会的千百条支脉开始汇归为一条文化洪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民族绝处逢生，马克思主义也使古老的中国文化枯木逢春——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在万卉纷呈的西方思想的园地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近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丛林最后皆遮蔽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树之下？这个徘徊于中外人士脑际中的世纪之问，长期以来极少有人给以正面回答。当然，只言片语的结论有一些，情绪化的措辞也不少，总之缺少理性的推导，没有科学的论证。美国学者窦宗仪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做出过比较研究的学者，但他的著作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两家的某些哲学范畴进行比较，故立论聚合的焦点相对较狭，没有对二者的学脉渊承^①、思想进程进行深层挖掘。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根源在中国，是传教士们把这个源头介绍到了西欧，经马克思的科学化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尽管李约瑟博士没有

① 渊承：渊源与传承。

对此展开详细论证，但此话出于这位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学者之口，无疑一言九鼎。持有与李约瑟相似观点的中外学者还有一些，30年代，朱谦之就对中国宋明理学对欧洲的影响发表过论文，其说大抵可信。解放后，贺麟、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都觉察到了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一些内在相似之处，但多半带有推理的性质。这些皆反映了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绝非一件偶然的事情，即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在中国文化之上”。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完成了近代史乃至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史的“文化—意识形态”大转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文化。但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才使得中国人民掌握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才出现了共产党，中国革命才充满了希望，运作几百年的中国思想和哲学的缓慢变革才迅速转化为社会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由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而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正是二者的高度亲和与结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拨正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绝非像港台新儒家所说是“‘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乘虚而入”。“五四”时期“乘虚而入”的西方思想势如潮水，马克思主义原来不过是杂在它们中的一员。那些诸如什么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尼采主义、叔本华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罗素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想，可谓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些思想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成为一些文人雅士们的精神奢侈品，无一形成气候。就连胡适贩来的影

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也顿时相形见绌，甚至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化论也不得不退居其后。显然，那种以简单的偶然论或命定论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人，不是戴着反共的有色眼镜就是缺乏对历史和思想的深入探究。不过，他们的诘问和答案，却激发了人们必须正视和回答这一历史和现实的课题。

本书愧难胜担此任，但是，上述问题确也曾不时在我的思绪中盘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流、会通和融合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思想成果。考察这一问题不能离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脱离这一人类文化传播的恢宏背景，孤立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单纯性比较研究，或者对若干哲学范畴进行纯思辨的考量，是不可能得出问题的正解的。尽管比较研究是一个基本手段，但是，我们比较的焦距可以拉长，视野应该扩大，而焦点则必须转换——转换到中西文化会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学脉渊承和心路旨归上来，这样，或许可以就此问题给人们以一种豁然一新的感受，也或许可以给有志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们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悦和启迪。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中国文化对于域外文化并非来者不拒、照单验货，而有一个根据中国社会的内在机制自然选择、汰劣擷优的过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最成功地传入的外来文化莫过于佛教了，假若佛教的传入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算起，经过四个多世纪的传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它才能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经过 1100 多年的中国化，它方被儒学所吸收。其中，有的“原装”佛教宗派自然消失了，有的彻底中国化了，而被中国哲学吸收的正是那些改装了的、中国化的佛理。佛教作为宗教虽然在形式上定居了下来，但它在内容上却完全被同化为中国的民族文化，除唐代武则天出于排李的政治动机把佛教置于道教之上，极少有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将佛教超越和凌驾于儒学之上。由此可知，外来文化虽然能在中国文化园地中获得一席之地，但却不得不接受中国化这个事实。中国化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没有天然的亲和力和相通相似的结合点，一厢情愿的中国化恐很难实现。

马克思主义则不同，中国人对它没有太多的生疏感和排异性，从其一开始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在短短几年内便蔚为显学，仅用了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席卷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胜利，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辉煌胜利，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真理，也验证了“哲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导”这一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个政治和军事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基于这一立意，本书论证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意义及其历史作用，并以此作为理论杠杆考察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现实的回声；接着又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了通盘回顾，逐一考察了外来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长廊中的匆匆来去和几进几出，从中总结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前提性条件和内在机制，尤其在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媒介作用，是不可缺省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认同，还有着历史上其他外来文化所不具备的深层原因，这是本书探索的一个重点。海德格尔曾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①文化也是如此，假若“文化—意识形态”飘浮、游离于主体的太空中，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启意志，它在现实的土地上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虽然产生在德国，但是，中国人认同它，它也认同中国这个“家”——这绝非一种诗意的浪漫，而是铁一般的事实。本书严肃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血缘联系，人们可从中考察和验证李约瑟博士论断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不可能用一种量化的方式直接计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多少中国传统，而是着重追溯当年东学西渐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关系，在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捕捉中国哲学的真实踪影，还原一些被德国人的理性所遮蔽了的本来原则——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此处的研究绝非思辨的抽绎，它建立在对资料的分析上。尽管资料有待继续发掘，但对现有资料的理解足以说明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至少为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或研究提供了启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了解中国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交往过程，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袭了欧洲传统，然而，他们的哲学都存在着鲜明的背弃欧洲传统的趋向。形成这种趋向的根源只能从欧中文化交流中寻找，从16至18世纪的东学西渐中寻找，从中国哲学中去

① [德]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Nurnoch kannein Gottunsretten, Der Spiegel, Vol31, 1976。

寻找。在欧美汉学界，也有人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和休谟的怀疑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这些都不是信口呓说。李约瑟把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至少有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内证：中国哲学的总体性判定是无神论，尤其儒学更是如此；儒家哲学的实用理性主义和实在主义的“事物”观代表着整个中国哲学的致思趋向；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大同理想可以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价值观；以儒学辩证法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就是中国人特有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为“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人类特有的思维形式。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认识到辩证逻辑中这种光彩夺目的宝贵价值，早就在中国哲学中存在着，只不过人们从前对此缺少深入探索罢了。

不过，儒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纯粹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缺少那种高度分析的论证方法、严谨缜密的推理逻辑和系统形式的体系建构，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也是西方哲学的优点。但是，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动态调控和整体运作的的能力却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尤其中国哲学那些精辟的、言简意赅的、格言式的直觉思维足可抵洋洋大观的分析性诠释和逻辑论证，这种直觉悟性能力使西方人只能望其项背。当然，对于纯属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在本书中不宜展开，因为本书的宗旨在于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史。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对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了相关分析，但是鉴于窦宗仪的著作中心就是该问题，故本书没有多花笔墨，而且角度也与窦宗仪明显不同，因而立论自然迥异。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十分丰厚和有价值，这只能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挖掘、考析了。

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之所以

于70年后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固然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历史机遇所致，但也是思想自身的逻辑和历史客观的逻辑合力的结果。如上所述，明清以来，在儒学没落之秋，中国新型的“文化-意识形态”一直在缓慢地孕育和嬗变着，并且表现为中国学术思想内部的“理学”与“实学”之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表现为“玄学”与“经学”之争、“宋学”与“汉学”之争。自西方近代思想楔入之后，这些学术、思想派别发生了分化和裂变，“五四”以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组合，尽管各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旨意所归轩輊参差。从中国传统思想链来看，“实学”派演变为西化派，既主张仿效西方的工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又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玄学”派有的蜕变为封建顽固势力，有的则在吸收消化西方哲学思想中演变成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氤氲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胎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成熟的阶级，故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没有定格出棱角鲜明的个性品格。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可归结为进化论的世界观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这也是本书所要说明的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结构体系，但是他们从19世纪末叶以来对西学的不懈追求和在“中体西用”论上与文化保守主义交锋，以及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跟西方哲学所进行的一些结合和会通，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传播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铺垫了理路心道。因此，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过渡期，即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新型“文化-意识形态”大转型的缓冲期。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小春秋”，即千百年来少见的“百家争鸣”。本书对这一